

倾向传统还是走向现代： 性别意识与养老责任态度

——基于中国、日本、韩国的比较研究

晏子*

【摘要】通过对 2012 年中国、日本、韩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论文创新性地将“性别意识”引入了社会变迁与代际互动理论分析框架，比较分析了三国居民养老责任态度的特点及影响因素，对家庭现代化理论在东亚社会的适用性进行了检验。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现代化及社会支持体系的变化，尽管三国人口转型模式和代际互惠传统相似，但在养老责任态度方面却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中国居民更倾向家庭养老，日本居民更倾向社会养老，韩国居民态度中立；性别意识对养老责任态度存在直接影响，两者变迁并不同步，三国的互动模式亦不一致；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导致传统性的消逝；东亚社会态度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兼容共生，正是延续东亚社会家庭养老的动力源泉。

【关键词】养老责任态度 性别意识 中日韩比较研究 家庭养老 社会养老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2018)06-0112-25

一、引言

按养老生活服务和费用的承担者来划分，养老类型大致可分为：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家庭养老，指由家庭成员（子女或老人自己）负责提供养老资源，

* 晏子，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本文曾在南京大学“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中国婚姻和家庭的变迁”会议上宣读，感谢郑真真老师、贺光烨老师、朱安新老师及其他与会者的点评；特别感谢加藤笃史教授的宝贵意见和修改建议。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奖学金资助（201706230194）。

以满足老年人经济、生活照料和情感上的需求，居住方式既可以是居家养老也可以是机构养老。社会养老，指由国家和社会作为主要承担者，提供养老资源，子女不承担任何养老责任，或老年人依靠养老金生活（刘贵平，1999）。

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在迈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现代性因素会重塑个体价值观，打破代际均衡。核心家庭模式会逐渐扩展，亚洲传统的扩展家庭模式将日渐式微，人们家庭观念的转变将带来孝道伦理的衰落，进而造成家庭养老功能的部分外溢（古德，1986）。然而，现代化理论所预设的“传统文化衰亡论”后续被越来越多的研究所质疑。如多元现代性理论指出，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现代化转型之路，特定社会的传统文化观念并不必然随现代化消亡（Eisenstadt，2000）。实证研究也发现，即使是欧洲，家庭养老也不一定会被社会养老所挤出（Motel-Klingebiel et al.，2005；Silverstein et al.，2010）。正在经历“压缩型现代化”的亚洲国家（Chang，2014），社会态度的传统性与现代性是呈现对立还是合作尚待检验。

东亚社会历史上崇尚家庭养老，如享有相似文化渊源和人口转型模式的中日韩三国。根据最新统计数据，三国中：日本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韩国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与中国进入老龄化时间较为接近；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见表1）。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支持体系存在差异的三国，拥有不同的现代化发展序列：日本最高、韩国其次、中国最低。按照现代化理论推断，三国代际关系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亦将呈现梯度差异。处于现代性与传统性剧烈碰撞阶段的三国是检验现代化理论的最佳样本。

表1 中日韩老龄化速度

国家	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进入年份）			所用时间/年	
	7%	14%	20%	7%→14%	14%→20%
中国	2002	2025	2034	23	9
韩国	1999	2017	2026	18	9
日本	1970	1994	2005	25	11

资料来源：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16）》“表2-18 主要国の65歳以上人口割合別到達年次とその倍加年数”。

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儒家文化源远流长的东亚社会，家庭养老功能是否也会如西方社会一样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东亚社会是如何平衡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正在经历不同现代化历程的三国，民众的养老责任态度是否会不同？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通过2012年中日韩三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三国居

民的养老责任态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对三国的比较分析，不仅是对家庭现代化理论的检验，更有助于我们深入探讨家庭关系变迁对养老和公共政策的启示。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现代化理论与养老责任态度

纵观已有文献，对现代化理论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学者们关注现代化进程中家庭关系的变化，采用一国或跨国数据验证现代性因素对代际关系的冲击。厄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Burgess，1960）和考吉尔（D. O. Cowgill）（Cowgill，1972）是最早通过对西方国家的比较研究证实经典现代化理论推断的学者。20世纪末，经典现代化理论开始成为解释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家庭养老日渐式微的主要分析框架（Aboderin，2004；Malhotra & Kabeer，2002）。

第二阶段的研究回应并质疑了“传统文化衰亡论”。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尽管家庭代际关系受现代化冲击，但现代化程度和养老照护责任并不一定是简单的线性负相关（现代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社会养老）。在一些福利制度完善的发达国家，“混合责任”非常常见（Motel-Klingebiel et al.，2005；Silverstein et al.，2010），特别是针对亚洲国家的一些定量研究发现，家庭养老占比仍旧很高（Levande et al.，2000；Koyano et al.，1994）。具体分为两条研究路径：第一条研究路径关注养老需求主体——亲代的意愿，第二条研究路径关注养老供给主体——子代的孝行。两条路径均发现，与西方社会的核心家庭模式不同，东亚社会有多代同堂的居住传统（Levande et al.，2000；Takagi et al.，2007；王跃生，2017），所以很多研究都对子代与亲代的居住方式进行统计控制（鄢盛明等，2001；杨菊华、李路路，2009；狄金华等，2013）。但现实生活中的居住方式本身就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结果，居住方式的延续并不能反映孝道的衰落，例如，尽管研究显示，日本仍然拥有较高比例的同住比例（Takagi et al.，2007），但认同家庭承担养老责任的占比却极低（ICPSR，2012），甚至亲代也并不期待子代提供经济支持或是生活照料（Yamato，2006）。此外，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女性参与劳动，但结构性制约及社会支持的不足，使子代不得不选择与父母同住（Chen & Pong，2010）。因此，将“是否同住”作为因变量并不能真实反映“孝道”的变迁。

第三阶段的研究则超越了现代化本身的讨论，转而思考孝道的内涵及养老责任态度如何随社会变迁而改变，关注文化与制度的深层次互动。研究发现，与西方社会的“接力模式”不同，“反馈模式”下的中国（费孝通，1983）深刻嵌套在“父慈子孝”的代际关系之下，多子会强化亲代选择家庭作为养老的依靠。但随着“父母身份非神圣化”（阎云翔，2006：207），赡养老人的传统父系基础被打破后（怀默霆，2001），原本双向流动的“反馈模式”已不再运转。“资源稀释理论”也指出，现代社会由“伦理转向”导致的下拉优先分配可能会造成亲代赡养资源供给不足（郭林、曾福星，2017）。特别是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子代数量及性别结构的实际变化，中国传统“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亦不得已顺势而变（朱安新、高熔，2016），而在代际失衡的背景下，配偶不仅是精神寄托，更承担了部分生活照料的角色（狄金华等，2013）。但不可忽视，个体随生命周期、经济约束和偏好不同，所带来的“同辈效应”（Ciabattari，2001；Inglehart & Norris，2003）。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1、H2、H3。

假设 H1：随着社会变迁，多子将不再强化家庭养老的倾向。

假设 H2：年龄越大，观念越传统，越倾向家庭养老。

假设 H3：代际失衡背景下，相较于未婚者，已婚者更倾向家庭养老。

有关亚洲国家的研究发现，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和经济发展带来职业和地域流动的同时，也会消解传统（Hirschman & Minh，2002）。如，中国义务教育普及和大学教育扩招极大提升了教育水平，但也带来了个体价值观念的兴起和家族观念的淡化（胡安宁，2017）。研究表明，更高层次的教育水平、非农工作、城市居住等都降低家庭养老的概率（Bian et al，1998）。据此，提出假设 H4、H5、H6。

假设 H4：教育水平越高的个体，公民权利及个体意识越强，越倾向社会养老。

假设 H5：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养老服务购买能力越强，越倾向社会养老。

假设 H6：居住在城市较居住在乡村的个体更倾向社会养老。

同时，随着教育机会分配性别差异的缩小，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庭，加入公共活动和市场劳动，女性经济地位、家庭权力的提升（狄金华等，2013），开始广泛地影响现代家庭和社会生活，传统养老供给主体——女性对照护责任的认知开始动摇（Hashizume，2010），照护责任的再谈判开始撕扯传统家庭代际关系（Long et al.，2009；Lee，2016）。据此，提出假设 H7。

假设 H7：随着女性经济地位、劳动参与率的提升，相较于男性，女性更倾

向社会养老。

综合这些研究不难发现，学界已经注意到现代化进程中，日渐兴起的性别平等思潮对父权制为特征的儒家孝文化的冲击（邓希泉、风笑天，2003）。但目前国内尚且没有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已有文献大多局限于对性别意识简单的概念介绍、对性别意识认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Predictors）的统计描述和回归分析，尚缺乏对性别意识结果变量（Consequences）的实证研究。

（二）现代化理论、性别意识与养老责任态度

性别意识（Gender Ideology）^①作为嵌入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体系中指导个体思想和行为的社会结构，是现代价值观念的重要维度之一，亦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社会学将性别结构与经济、政治相并列，运用于分析个体、人际互动与制度层面的嵌入和分化对个体观念和行为的影响（Risman，2004）。西方学界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对性别意识对政治参与、市场活动、家庭关系的形成和消解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罗纳德·英格哈特（Ronald Inglehart）和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通过对65个国家12年追踪数据的研究发现，现代化进程对性别意识的影响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工业化让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市场劳动；第二阶段，后工业化使得性别平等思潮开始冲击家庭、市场和政治生活。但他们也指出，尽管现代化进程会带来性别意识日趋平等，但一旦缺乏相应的文化土壤，西方的性别平等思潮极有可能遭受冲击（Inglehart & Norris，2003）。

有关家庭关系的跨国研究显示，性别意识对家务分工和照护责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Hu & Kamo，2007；Lavee & Katz，2002；Pimentel，2006；Nordenmark & Nyman，2003）。作为家务劳动和照护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生活经验和文化传统的影响，照料老人的工作往往由女性（女儿或儿媳）承担。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 Theory）认为，这是因为家庭社会关系是社会性别意识的再生产（Hartmann，1981）。

父权制下“被性别化”的照护规范（Gendered Care Norms）促使女性不得不在照护责任和市场劳动间寻求平衡，因此，对照护责任再谈判（Renegotiation）的研究既可检验照护规范是否受到挑战，更可以检验传统文化规范的脆弱性（Connidis & McMullin，2010）。尽管大量研究（Lamb，2000；

^① 又被西方学者称作 Gender Role Attitudes、Attitudes about Gender、Gender-Related Attitudes、Gender Egalitarianism。

Lee, 2016; Hashizume, 2010) 证实了传统照护规范正在遭受现代化前所未有的挑战, 但尚没有研究下沉至微观视角对性别意识与养老责任态度的影响机制展开深入探索。过去半个世纪以来, 经历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人口重大变迁的东亚社会, 是近年来世界上社会变迁、家庭变化最为活跃的场域, 深受父权制儒家孝文化和家文化传统的影响, 是研究社会经济转型对家庭影响最佳的样本。据此提出本文的核心假设 H8 和分析框架 (见图 1)。

假设 H8: 伴随现代化发展, 东亚社会性别意识愈加平等化, 传统家庭照护责任开始遭受前所未有的撕扯, 进而影响养老责任态度, 动摇传统代际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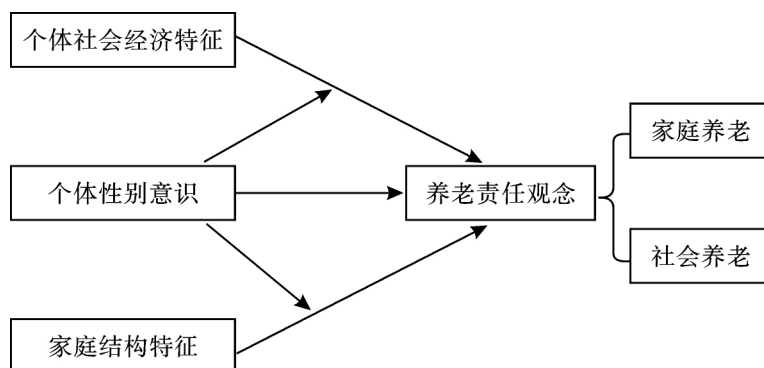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变迁与代际互动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说明及分析策略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日本综合社会调查 (Japa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JGSS) 和韩国综合社会调查 (Korean General Social Survey, KGSS) 2012 年发布的调查数据。三个数据库全面系统地对居民个人、家庭、社会等多个层次的数据进行了搜集, 且对居民养老责任态度、性别意识等变量采用了统一问题进行度量, 是有关三国综合调查的最新兼容数据。CGSS2012 的有效样本为 11 766, 应答率为 71.5%; JGSS2012 的有效样本为 4 668, 应答率为 58.8%; KGSS2012 的有效样本为 1 397, 应答率为 60%。本文从子代视角展开分析, 选取了年龄为 20-60 岁的样本, 删除缺失值后: CGSS2012 的有效样本为 3 041, 占总样本的 25.8%; JGSS2012 的有效样本为 2 834, 占总样本的 60.7%; KGSS2012 的有效样本为 914, 占总样本

◆ 论文

的 65.6%。

本文数据分析采用 R. Studio 软件，首先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养老责任态度方差分析。随后，通过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以个体特征、家庭结构特征、性别意识作为自变量，探究三国在养老责任态度上的异同，并通过多因素交互作用模型对性别意识的影响效应进行检验。

(二) 测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养老责任态度，CGSS2012、JGSS2012 和 KGSS2012 中有关于居民社会态度的相关问题，本文选取“如果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帮助，比如买东西、打扫卫生、洗衣服等，您认为最主要应该由谁提供这些帮助？”作为因变量，将其具体操作化为一个虚拟变量：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见表 2）。

表 2 三国关于养老责任态度测量的问题

CGSS	JGSS	KGSS	问题	选项	具体操作
				家庭成员	1 = 家庭养老
				政府机关	
				非盈利组织（如慈善机构、教堂、寺庙等宗教机构）	0 = 社会养老
M15		60A	如果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帮助，比如买东西、打扫卫生、洗衣服等，您认为最主要应该由谁提供这些帮助？	收费的服务机构或个人	
	OP5SRMDY			1: 个人和家庭; 2、3、4、5: 政府	1→1 = 家庭养老; 2、3、4、5→0 = 社会养老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自变量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家庭结构变量，包括调查者的子女数量、调查者婚姻状况两个变量。

第二类变量为性别意识变量，根据香农·戴维斯（Shannon N. Davis）和西奥多·格林斯坦（Theodore N. Greenstein）（Davis & Greenstein, 2009）对多个大型问卷调查对性别意识测量的整理，性别意识大体包含 6 个层面的内容^①，本文选取三国问卷中代表三个不同维度的 3 个兼容问题进行测量（具体见表 3），

^① 这 6 个层面包括：（1）Primacy of Breadwinner Role；（2）Belief in Gendered Separate Spheres；（3）Working Women and Relationship Quality；（4）Wife/Motherhood and the Feminine self；（5）Household Utility；（6）Acceptance of Male Privilege。

这三个维度反映的正是个体与性别角色分工的冲突与矛盾。通过被调查对象对3个问题的同意程度（非常同意、相当同意、同意、无所谓同不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来反映其性别意识，由于3个问题都是负向的，因此5个选项分别记1至5分，分数越高，代表性别意识越现代；3个问题使用统一测量逻辑，具有较强内在相关性，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时，本文对性别意识的3个项目进行了公共因子提取，通过主成分分析（PCA）^①抽取一个性别意识公共因子。

表3 三国关于性别意识测量的问题

维度	问题	CGSS	JGSS	KGSS
性别分工	男人应该负责挣钱，女人应该负责顾家	M2-2	Q4WWHHX	51B-2
情感亲密程度	如果小孩还没上学，妈妈出去工作会影响小孩的成长	M1-2	Q4JBMMCC	51A-2
自主性	有工作当然好，但是大多数女人真正想要的是家庭和孩子	M1-5	Q4WNMGA	51A-5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控制变量为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②等。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图2和表4展示了控制变量、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控制变量、自变量与因变量都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见表4）。养老责任态度的均值显示，日本居民更倾向社会养老（均值=0.13），中国居民更倾向家庭养老（均值=0.87），韩国居民的态度处于中日之间（均值=0.47），三国的标准差相对恒定，在0.27至0.47间浮动，ANOVA对养老责任态度的F检

^① 本文选择“主成分法”基于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公变量进行加权，本文三国样本KMO均处于可接受范围，Bartlette球形检验达到极其显著水平。

^② 本文选取自评经济状况这一变量度量经济能力。一是因为三国的人均GDP存在差距，直接用年收入度量差异较大，且原数据存在较多缺失值；二是自评经济状况直接体现了个体对于家庭经济能力的度量；较好的经济能力能增强个体自我养老时养老服务购买能力。

◆ 论文

验非常显著 ($P < 0.001$)，说明三国的差异明显 (见表 5)。可见，虽然三国人口转型模式及代际互惠传统相似，但在养老责任态度上却大相径庭，符合前文关于现代化理论的推断。

图 2 展示了各控制变量与三国居民养老责任态度的相关情况，三国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居民，无论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及居住状况如何，都更倾向家庭养老；而日韩居民则更倾向社会养老。图 3 展示了家庭因素与三国居民养老责任态度的相关情况，三国在这两个指标上存在明显差异：大多数中国家庭仅有 1 个小孩，这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有关，但家里有 3 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则更倾向家庭养老；日韩家庭中丁克家庭和有两个小孩的家庭较为普遍；其中日本丁克家庭占很大比重，但无论是丁克家庭还是大家庭，都更倾向社会养老。就婚姻状况而言：中国居民无论婚姻状况如何，都更倾向家庭养老；日本家庭中未婚居民更倾向社会养老；韩国居民的婚姻状况在两种责任态度上的分布差异不大。

图 4 的箱线图展示了性别意识与三国居民养老责任态度的相关情况。三国持不同养老责任态度的居民在性别意识上存在一定差异 (中位数高低不一)。其中：中日居民的性别意识态度均与其养老责任态度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P < 0.001$)，倾向社会养老的居民其性别意识较倾向家庭养老的居民现代 (中位线偏高)；韩国持不同养老责任态度的居民性别意识则差异不大。但总体来看，三国居民的性别意识都偏传统。

表 4 变量的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取值	国家	均值	标准差	相关系数 ^a
因变量					
养老责任态度	家庭养老 = 1; 社会养老 = 0 (政府、非盈利组织、收费服务机构或个人、责任均摊)	中国	0.87	0.34	1.00
		韩国	0.34	0.47	1.00
		日本	0.13	0.74	1.00
自变量					
性别意识	连续变量，分数越低，性别意识越传统	中国	-0.00 ^b	1.00	-0.06 ^{***}
		韩国	0.00 ^c	1.00	-0.05
		日本	-0.00 ^d	1.00	-0.12 ^{***}
家庭结构 婚姻状况特征	已婚 = 1; 未婚 = 0	中国	0.99	0.10	0.00
		韩国	0.67	0.47	-0.02
		日本	0.70	0.46	-0.02 ^{***}
子女数量	连续变量	中国	1.52	0.84	0.10 ^{***}
		韩国	1.41	1.11	0.04
		日本	1.39	1.17	-0.01 ^{***}

(续上表)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与取值	国家	均值	标准差	相关系数 ^a
控制变量					
年龄	连续变量	中国	43.63	10.02	-0.07 ^{***}
		韩国	41.66	11.67	0.10 ^{***}
		日本	42.25	11.08	-0.06 ^{***}
性别	男 = 1; 女 = 0	中国	0.51	0.50	0.04 ^{**}
		韩国	0.45	0.50	0.07 ^{**}
		日本	0.46	0.50	0.07 [*]
教育水平	拥有大学以上文凭 = 1; 大学以下文凭 = 0	中国	0.20	0.40	-0.08 ^{***}
		韩国	0.35	0.48	-0.10 ^{**}
		日本	0.50	0.50	-0.09 ^{**}
居住地	农村 = 1; 城市 = 0	中国	0.55	0.50	0.19 ^{***}
		韩国	0.83	0.37	-0.04
		日本	0.66	0.47	-0.02 ^{***}
自评经济状况	定序变量; 1 = 经济状况低于平均 水平; 2 = 经济状况处于平均水 平; 3 = 经济状况高于平均水平	中国	2.65	0.72	0.05 ^{**}
		韩国	2.61	0.95	-0.02
		日本	2.69	0.90	0.04 ^{**}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1。a. 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b. -0.0005117。
c. 8.47e - 11。d. -1.09e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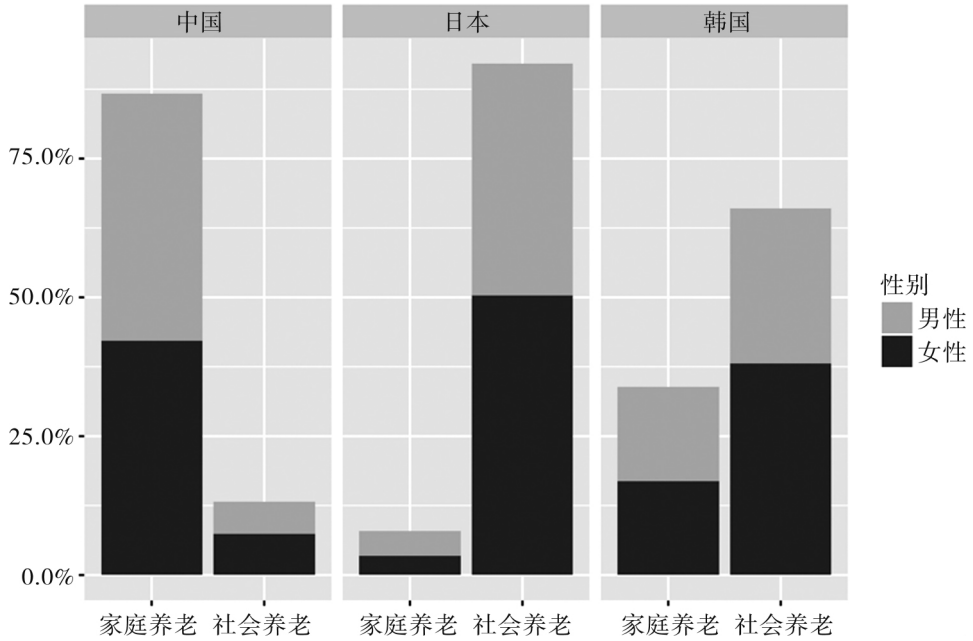
表5 养老责任态度方差分析 (ANOVA)

国家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P 值	Eta ²	F 值
中国	3 041	0.87	0.34	0.000	0.28	1 312.270
韩国	914	0.34	0.47			
日本	2 834	0.13	0.27			
基准国家	国家	均值差异 ^a	标准差	P 值	Welsh 值	Brown - Forsy 值
中国	日本	0.734	0.015	0.000 ^{***}	1 466.278 ^{***}	1 412.353 ^{***}
	韩国	0.528	0.017	0.000 ^{***}		
日本	中国	-0.734	0.015	0.000 ^{***}		
	韩国	-0.206	0.021	0.000 ^{***}		
韩国	中国	0.528	0.017	0.000 ^{***}		
	日本	0.206	0.021	0.00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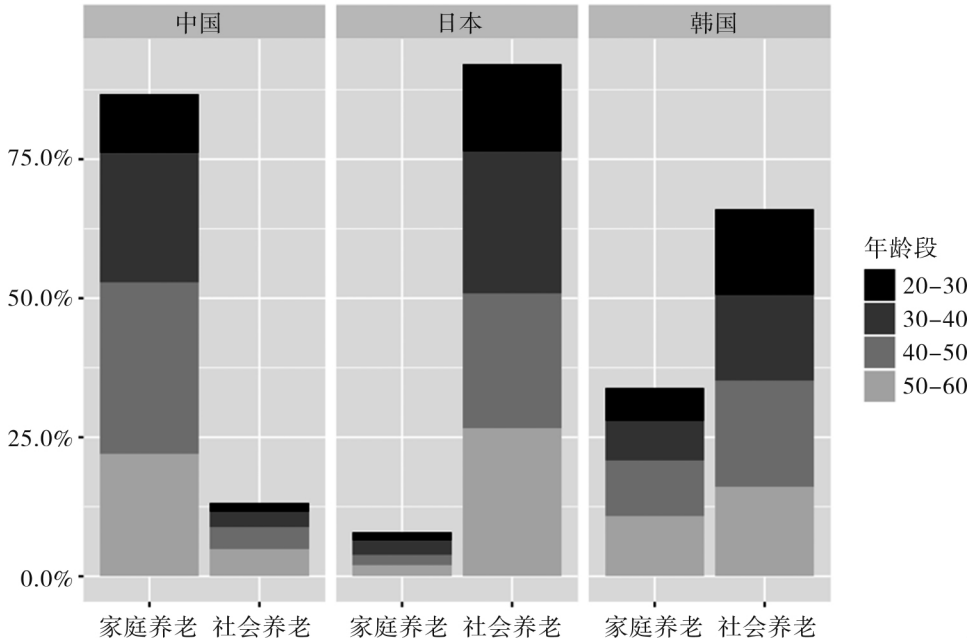
注: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1。a. 由于组数方差不齐, 这里使用 Games - Howell 检验方法进行两两比较。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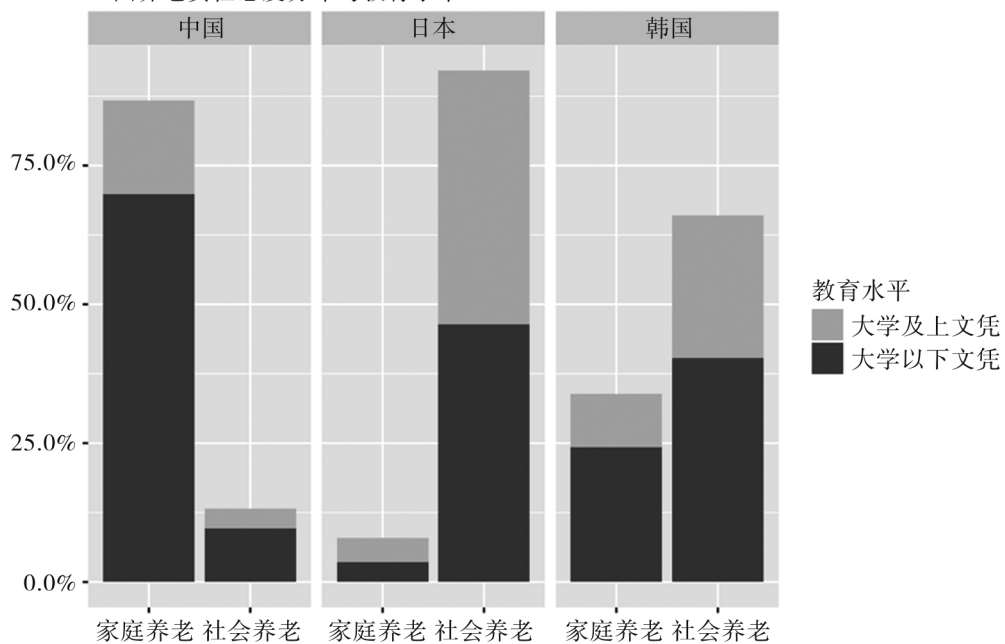
三国养老责任态度分布与性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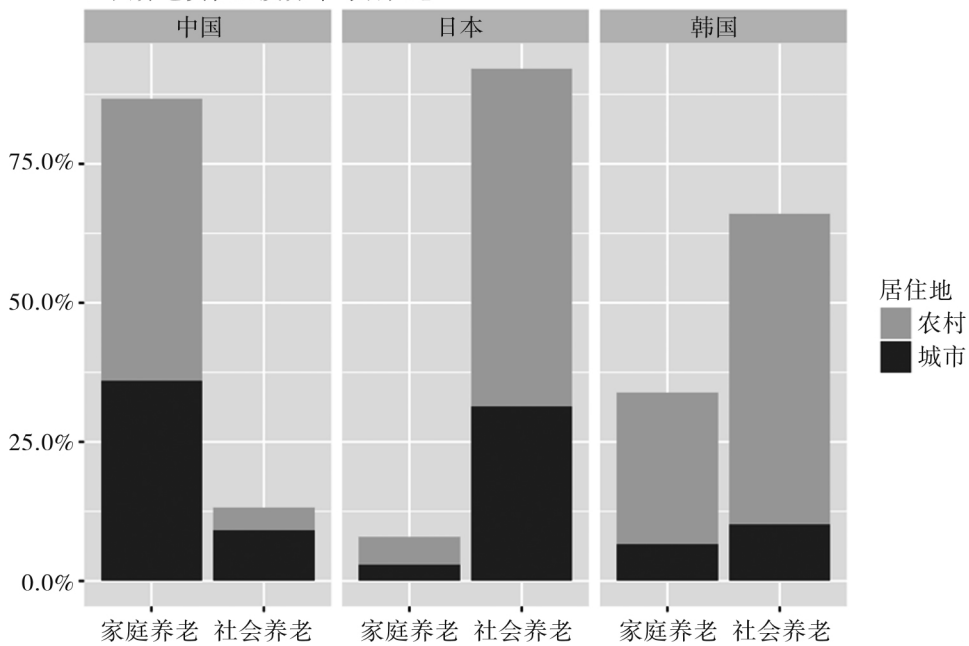
三国养老责任态度分布与年龄



三国养老责任态度分布与教育水平



三国养老责任态度分布与居住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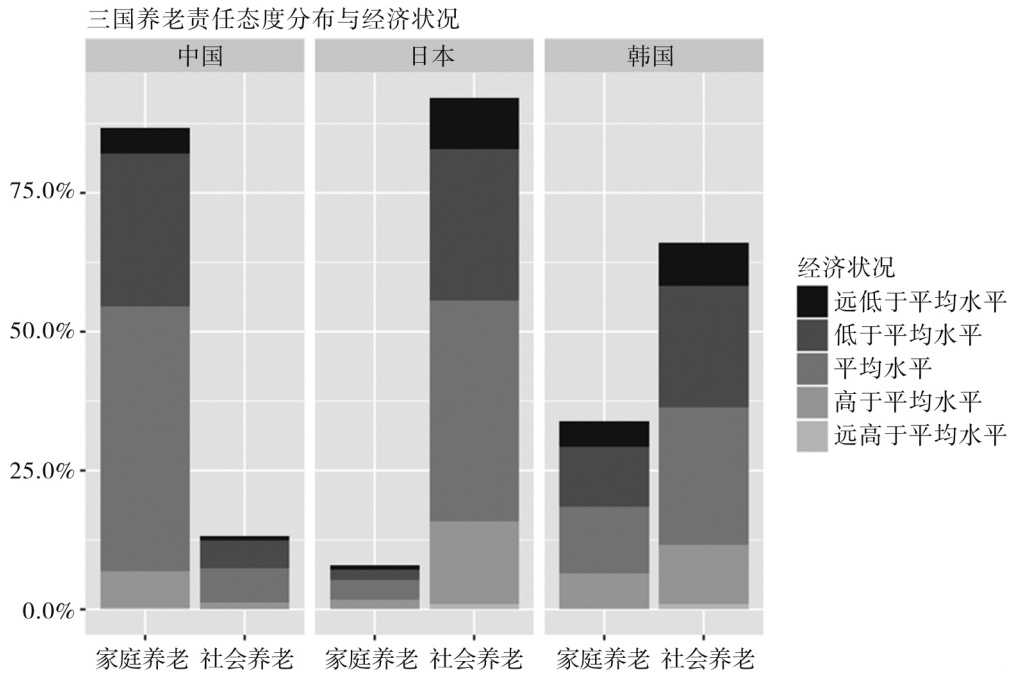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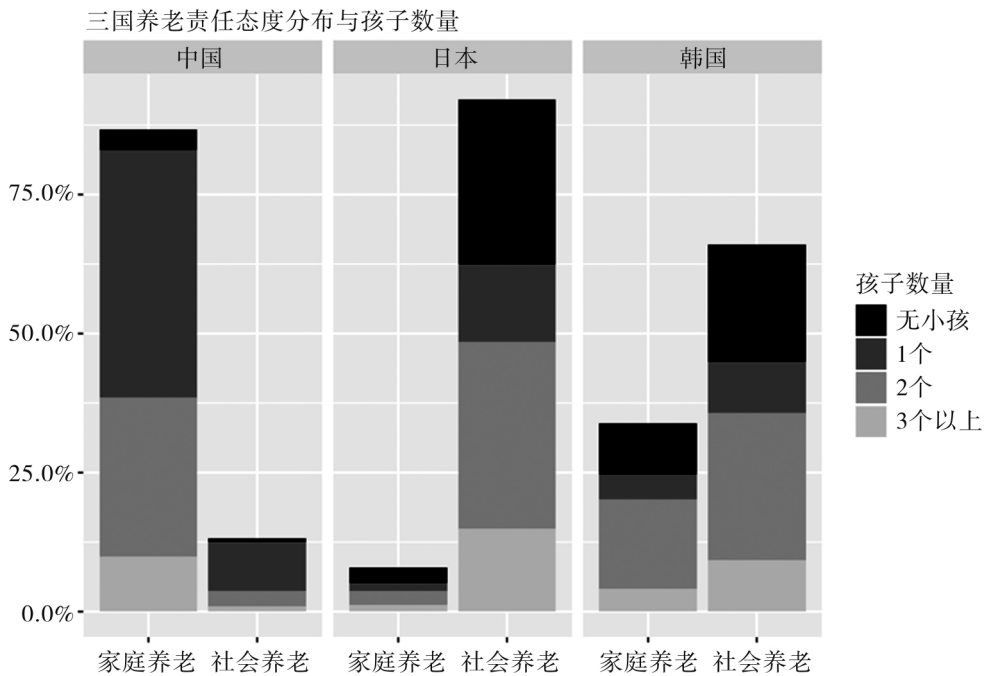


图 2 控制变量与养老责任态度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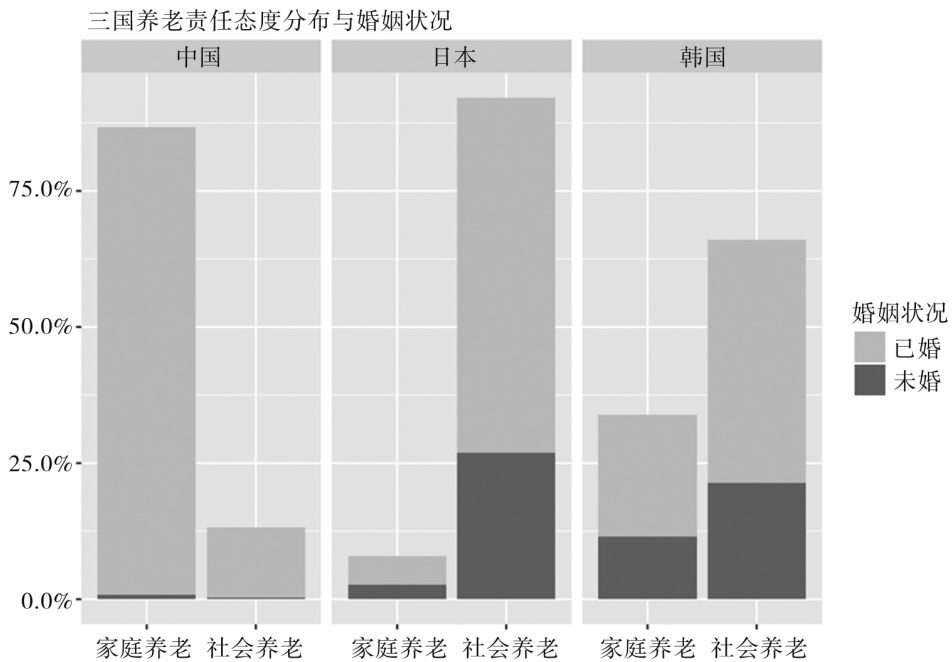


图3 家庭结构特征与养老责任态度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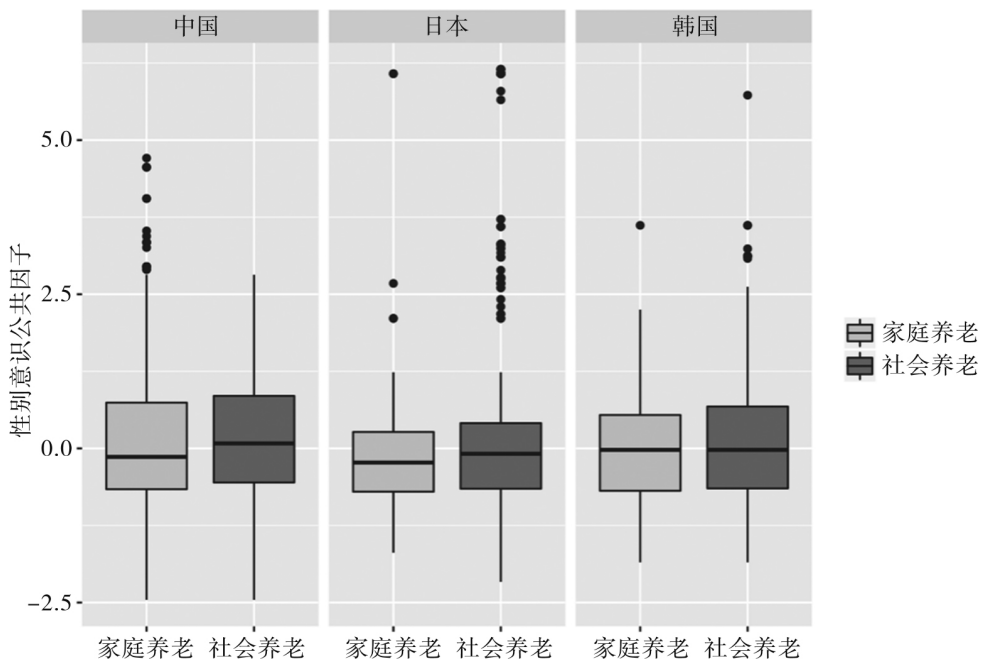


图4 性别意识与养老责任态度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 回归分析

为了更好地辨析各主要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影响关系。本文首先仅在模型中纳入个体因素，随后再逐步纳入家庭因素及性别意识因素，最后着重考察性别意识与主要自变量的交互作用，即性别意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三国居民的养老责任态度。表6回归模型中， $0.1 < \text{容差} < 1$ ， $1 < \text{VIF} < 5.0$ ，说明进入回归模型的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且各回归模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通过各模型的Pseudo R^2 可以看到，各变量对三国居民养老责任态度的解释力存在差异。随着家庭因素及性别意识变量分别纳入模型，模型的解释力不断增强。

1. 个体社会经济特征

控制变量个体经济特征的估计结果与现有文献及假设有所异同。性别对三国居民养老责任态度均显著正相关（ $P < 0.01$ ），说明相较于女性，男性更倾向家庭养老，验证了男性较女性养老责任观念更为传统。

年龄对中韩居民的影响效应显著，但却不同：韩国居民年龄越大，选择家庭养老的几率就增大（ $P < 0.05$ ），与前文假设一致；而中国居民，随着年龄的增长，选择家庭养老的几率却减小了（ $P < 0.01$ ）；先行研究也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居民面对子代赡养乏力的现实，会降低对子女孝道的预期，对两代人的责任义务分割进行更多理性的计算（贺雪峰，2007），代际关系逐渐走向“代际合力”模式（李永萍，2018）。

自评经济状况对中日两国都显著正相关（ $P < 0.05$ ），但略有不同：家庭经济处于平均水平的中国居民，经济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选择家庭养老的对数几率就增加0.39左右；而经济状况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日本居民，经济状况每增加一个单位，选择家庭养老的对数几率就增加0.41左右。中日两国经济状况影响效应的不同，突出反映了中日两国经济水平差异对养老意愿的影响：由于2012年养老保险尚未全面覆盖，经济状况处于中间水平的中国家庭相较于底层家庭更具备家庭养老的能力，但又不具备机构养老的财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相对完善的日本，收入水平较高的居民更倾向家庭型自助养老。这一结果同时也验证了代际互动可能更好地表现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中（杨菊华、李路路，2009）。

居住地仅对中国居民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 $P < 0.01$ ），农村居民选择家庭养老的几率大于城市居民。这揭示了中国城乡差距的存在，也进一步检验了家庭现代化理论对“现代性进村”的假设：农村家庭并没有受现代性冲击而弱化，反而表现出相当的韧性（李永萍，2018）。

教育水平仅对韩国居民具有显著影响（ $P < 0.01$ ），但影响效应与前文假设

相反。教育水平每增加一个单位，韩国居民选择家庭养老的对数几率就降低 0.44 左右。前人研究也发现，东亚几国中韩国子女对父母的支持超过日本和中国大陆（杨菊华、李路路，2009）。

2. 家庭结构特征

在控制个体因素的影响下，表 6 模型 2、模型 5、模型 8 展示了家庭因素对三国养老责任态度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子女数量和婚姻状况对日本居民均不显著。但对中国居民，子女数量非常显著（ $P < 0.01$ ），子女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中国居民选择家庭养老的对数几率会相应的增加 0.28，这一结果验证了中国传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家庭观念的绵延。对于韩国居民，婚姻状况具有显著性（ $P < 0.05$ ），相较于已婚居民，未婚居民选择家庭养老的可能性更大；而婚姻状况对中日两国居民并不显著。^①

3. 性别意识及交互效应

在控制个体因素和家庭因素的影响下，表 6 模型 3、模型 6、模型 9 考察了性别意识对养老责任态度的影响，模型 5 和模型 6 的卡方检验显著（ $P = 0.005391$ ），证明性别意识对日本居民的养老责任态度具有较强的直接影响效应，即随着性别意识的增高，日本居民选择家庭养老的对数几率就降低 0.30，证明性别意识越现代的日本居民，越倾向社会养老。

为进一步验证性别意识的影响效应，本文对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居住地及子女数量等与现代化发展紧密相关的变量与性别意识进行交互，以验证性别意识对养老责任态度的影响效应（见表 7）。

表 7 的模型 1 显示，年龄与性别意识交叉项系数为负且显著（ $P < 0.001$ ），意味着年龄大、性别意识现代的中国居民，倾向社会养老。这与前人的研究（Brewster & Padavic, 2010; Ciabattari, 2001）并不一致，但却刻画出了中国老人对家庭养老的偏好并不完全出于“经济理性”，更多是一种嵌入生活境遇中的“情境理性”（田北海、王彩云，2014），体现了亲代对子代的包容和理解。

模型 2 中，教育与性别意识交叉项系数为负且显著（ $P < 0.1$ ），意味着拥有大学以上学历、性别意识现代的日本居民，倾向社会养老。这与大量前人研究相符，即教育水平的提升与更加现代的性别意识显著相关，性别意识现代的个体更倾向社会养老（Bolzendahl & Myers, 2004; Brewster & Padavic, 2010; Brooks & Bolzendahl, 2004; Ciabattari, 2001; Corrigan & Konrad, 2007）。

^① 婚姻状况对中国居民并不显著的另一原因，可能是因为样本量中占 99% 的样本均已婚。

表 6 养老责任态度影响因素模型

	中国			日本			韩国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年龄	-0.02*** (0.01)	-0.02*** (0.01)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2** (0.01)	0.02** (0.01)
性别	0.37*** (0.11)	0.39*** (0.11)	0.39*** (0.11)	0.43*** (0.14)	0.42*** (0.14)	0.38*** (0.14)	0.39*** (0.14)	0.35** (0.15)	0.36** (0.15)
教育水平	-0.14 (0.13)	-0.11 (0.13)	-0.11 (0.13)	0.15 (0.15)	0.15 (0.15)	0.18 (0.15)	-0.45** (0.17)	-0.44** (0.18)	-0.43** (0.18)
居住地	1.14*** (0.12)	0.97*** (0.13)	0.96*** (0.13)	-0.16 (0.15)	-0.17 (0.15)	-0.18 (0.15)	-0.11 (0.19)	-0.09 (0.19)	-0.11 (0.19)
经济状况平均水平	0.38*** (0.12)	0.39*** (0.12)	0.39*** (0.12)	0.16 (0.16)	0.18 (0.16)	0.18 (0.16)	0.06 (0.16)	0.08 (0.16)	0.08 (0.16)
经济状况高于平均水平	0.17 (0.20)	0.20 (0.20)	0.20 (0.20)	0.39** (0.20)	0.43** (0.20)	0.42** (0.20)	0.25 (0.20)	0.31 (0.21)	0.31 (0.21)
婚姻状况		0.47 (0.45)	0.47 (0.45)		-0.14 (0.20)	-0.14 (0.20)		-0.47** (0.22)	-0.48** (0.22)

(续上表)

	中国			日本			韩国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子女数量		0.29*** (0.09)	0.29*** (0.09)		-0.01 (0.08)	-0.03 (0.08)		0.04 (0.10)	0.03 (0.10)
性别意识			-0.01 (0.06)			-0.30*** (0.09)			-0.11 (0.07)
常数项	1.70*** (0.28)	1.21** (0.50)	1.21** (0.50)	-2.41*** (0.32)	-2.43*** (0.33)	-2.41*** (0.33)	-1.16*** (0.39)	-1.29*** (0.39)	-1.24*** (0.40)
个案数	3 041	3 041	3 041	2 812	2 812	2 812	908	908	908
Pseudo R ² (McFadden)	0.0588	0.0642	0.0642	0.0265	0.0271	0.0350	0.0253	0.0297	0.0317
Likelihood Ratio		0.0015**	0.0046**		0.6637	0.0041**		0.0763	0.0593
Log Likelihood	-1 121.8273	-1 115.2801	-1 115.2585	-774.80176	-774.13119	-768.01985	-574.67687	-572.02692	-570.82947

注：参照组为：性别=女、居住地=城市、家庭经济状况=远低于平均水平、婚姻状况=未婚。*P<0.1,**P<0.05,***P<0.01,****P<0.01。似然比检验 (Likelihood Ratio Test) 参照项分别为：模型 1、模型 4、模型 7。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 论文

模型 3 中, 教育与性别意识交叉项系数为正且显著 ($P < 0.1$), 意味着拥有大学以上学历、性别意识现代的韩国居民, 倾向家庭养老; 居住地与性别意识交叉项系数为负且显著 ($P < 0.1$), 意味着居住在城市、性别意识现代的韩国居民, 倾向家庭养老。韩国数据的统计结果与前人研究均有所不同 (Carter & Borch, 2005), 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反映出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变似乎没有削弱其家庭凝聚力。

表 7 养老责任态度影响因素交互作用模型

国家	中国	日本	韩国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年龄	-0.02 ^{***} (0.01)	-0.01 (0.01)	0.02 ^{**} (0.01)
性别	0.38 ^{***} (0.11)	0.42 ^{***} (0.15)	0.38 ^{**} (0.15)
教育水平	-0.12 (0.13)	0.11 (0.15)	-0.44 ^{**} (0.18)
居住地	0.97 ^{***} (0.13)	-0.18 (0.15)	-0.10 (0.20)
经济状况平均水平	0.39 [†] (0.12)	0.18 (0.16)	0.08 (0.16)
经济状况高于平均水平	0.24 (0.20)	0.42 ^{**} (0.20)	0.32 (0.21)
婚姻状况	0.47 (0.46)	-0.13 (0.20)	-0.47 ^{**} (0.22)
子女数量	0.28 ^{***} (0.09)	-0.04 (0.08)	0.04 (0.10)
性别意识	0.04 (0.63)	-0.25 (0.39)	0.26 (0.40)
年龄 × 性别意识	-0.02 ^{***} (0.01)	0.002 (0.01)	-0.01 (0.01)
性别 × 性别意识	0.15 (0.11)	0.19 (0.18)	-0.09 (0.15)

国家	中国	日本	韩国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教育水平 × 性别意识	0.09 (0.13)	-0.34* (0.17)	0.30* (0.18)
居住地 × 性别意识	0.06 (0.13)	0.03 (0.17)	-0.31* (0.19)
婚姻状况 × 性别意识	0.43 (0.60)	0.001 (0.23)	0.16 (0.21)
子女数量 × 性别意识	0.10 (0.09)	-0.07 (0.10)	0.05 (0.10)
常数项	1.15* (0.51)	-2.41*** (0.34)	-1.31*** (0.40)
个案数	3.401	2.812	908
Pseudo R ² (McFadden)	0.07	0.04	0.26
Likelihood Ratio	0.14	0.35	0.038
Log Likelihood	-1 110.0358	-763.54964	-567.0405

注：参照组为：性别 = 女、居住地 = 城市、家庭经济状况 = 远低于平均水平、婚姻状况 = 未婚。* P < 0.1, ** P < 0.05, *** P < 0.01, **** P < 0.01。似然比检验参照项分别为：模型 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与启示

现代化进程中女性经济地位、劳动参与率提升，对性别文化规范、家庭关系的影响尽管得到了西方学界的大量关注，但鲜有学者注意到其对东方孝文化传统的影响。本文走出了经典现代化理论对代际关系的假定，通过中日韩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个体视角对现代化理论在东亚社会的适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时从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家庭结构特征、性别意识三个维度，考察了三国居民养老责任态度的影响机制，描绘了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三幅图景，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现代化发展序列呈现梯度的三国，养老责任态度也呈现梯度差异。描述性分析显示：仅约 13% 的日本居民认同家庭养老，约 34% 的韩国居民认同家庭养老，但认同家庭养老的中国居民却高达 87%。回归结果显示，老龄化程

度和工业化发展程度最高的日本，调查开展的2012年长期护理保险已实施了12年，代际关系更类似于西方式的“接力模式”，民众的养老责任态度偏现代。2012年的中国，公共服务水平相对较低，描述及回归结果都显示，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在现代化进程中以新的形态存续了下来，呈现出高度韧性——家庭始终承担着托底的功能（石金群，2017），同时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亲代对赡养的低预期。韩国现代化进程中教育水平的提升与家庭养老显著正相关显示，韩国似乎成功做到了经济现代化与文化传统性的平衡，完好地延续了孝道文化，民众的态度也较为中立。

第二，现代化进程中，性别意识平等化思潮会影响养老责任态度。回归结果显示：日本居民教育水平的提升与性别意识显著相关，性别意识现代的居民更倾向社会养老；中国在年龄偏大的群体中，性别意识偏现代的居民，也更倾向社会养老；韩国数据再次向我们呈现了与中日不同的图景，性别意识的转变并未撬动个体养老责任态度的变化，教育水平较高、居住在城市，性别意识现代的个体更倾向家庭养老。

第三，性别意识与养老责任态度的变化并不同步，性别意识的变化均滞后于养老责任态度。这意味着，三国在孝文化传统、家族情结和秩序观念上仍存在一定的文化共性。印证了罗纳德·英格哈特和皮帕·诺里斯关于性别意识变迁需要文化土壤支持的看法，也印证了马克·赫特尔（Mark Hutter）所说的，尽管世界范围内，家庭制度正在经历从传统向现代、从不同类型的扩大家庭向夫妇式家庭制度的转变，两性平等和以代际关系为主轴的家庭关系开始转变为以夫妻关系为中心，但家庭关系中的性别不平等仍旧存在（赫特尔，1987）。这也反映出，东亚社会性别意识变迁滞后于养老责任态度，与克里斯汀·舒尔茨（Kristen Schultz Lee）的假设正好相反。^①

本文的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东亚家庭变迁规律，并且在老龄化的背景下，对未来中国养老模式调整及相关公共政策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首先，随着社会养老的发展，家庭可能不一定是养老资源（生活照料、经济支持等）的直接提供者，但家庭的责任和亲情关系并不会随养老方式的变化而改变。现代化背景下的代际关系除了均衡互惠的公平交换，不会完全遁入“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私人领域”，家庭通过内在的自我调适和功能激活灵活嵌入了现代化系统中，以新的形势存续，缝合了转型时期的代际矛盾，并给予现

^① 克里斯汀·舒尔茨认为，养老责任态度可能滞后于其他社会意识的改变，如对性别平等观念、政府责任的看法（Lee，2016）。

代家庭以韧性，这种共生的韧性也许正是支撑传统东亚家庭养老的动力源泉。

其次，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性别意识平等化会冲击父权制为特征的孝文化，进而影响养老责任态度。女性作为无偿照料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福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建立完善的老年照护体系和家庭友好型制度安排，以应对东亚社会性别意识的觉醒，不仅是消除妇女从事有偿工作障碍、促进性别平等和重新分配家庭与国家照料责任的关键，更是化解由家庭支持弱化和社会支持匮乏产生的“外生性养老风险”的关键所在（穆光宗，2018）。

再次，尽管家庭养老的价值永恒，但家庭的小型化、生育率的低迷及年轻人口的流动迁移，都预示着家庭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将愈发迫切。在代际支持由“以文化为主向以行为为主，由强迫性、规范性向以家庭个体能力自愿选择模式转变”的过程中（姚远，2001），如何通过“找回家庭”，充分利用家庭的照料传统，同时借鉴日、韩的经验强化政府在家庭领域公共服务的功能，建立多元主体供给的家庭友好型公共政策，将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有机结合，是当前迫在眉睫的重要议题。

作为探索性研究，本文还有很多不足：首先，由于缺乏兼容数据，相关遗漏变量无法统一在数据中进行测量，因此本文不可避免受到选择性误差的潜在影响。其次，由于缺乏大规模历时性数据，本文仅采用了三国 2012 年的截面数据，虽然能够证实性别意识与养老责任态度之间的二元联系，但为了更好地揭示二者之间的因果推论，需要历时性数据的支持。因此，未来如果有更好的数据，这或是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亦可在现有的基础上看三国潜在在责任态度群体的具体影响机制。总而言之，有关性别意识及养老责任态度的研究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没有妥善解决，笔者也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通过学术同仁的共同努力来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 狄金华、尤鑫、钟涨宝(2013). 家庭权力、代际交换与养老资源供给. 青年研究, 4: 84-96.
- 邓希泉、风笑天(2003). 城市居民孝道态度与行为的代际比较. 中国青年研究, 3: 51-55.
- 费孝通(1983).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 6-15.
- 郭林、曾福星(2017). 中国家庭养老资源的稀释机制. 学海, 4: 141-147.
- 胡安宁(2017). 老龄化背景下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持: 观念与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 3: 77-95.
- 贺雪峰(2007). 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从“操心”说起. 古今农业, 4: 1-3.

◆ 论文

- 怀默霆(2001). 中国家庭中的赡养义务: 现代化的悖论. 中国学术, 4: 255 - 277.
- 李永萍(2018). 功能性家庭: 农民家庭现代性适应的实践形态.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 44 - 60.
- 刘贵平(1999). 社会化养老: 问题在哪里. 人口研究, 4: 31 - 33.
- 马克·赫特尔(1987). 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 宋践、李茹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穆光宗(2018). 低生育时代的养老风险.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 1 - 7.
- 石金群(2017). 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流变: 机制、逻辑与张力. 社会, 1: 71 - 73.
- 田北海、王彩云(2014). 城乡老年人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家庭养老替代机制的分析. 中国农村观察, 4: 34 - 40.
- 王跃生(2017). 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代际功能关系及特征分析. 开放时代, 3: 27 - 59.
- 威廉·J. 古德(1986). 家庭. 魏章玲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杨菊华、李璐璐(2009). 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 社会学研究, 3: 27 - 53.
- 鄢盛明、陈皆明、杨善华(2001). 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 1: 130 - 140.
- 阎云翔(2006). 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 龚小夏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 姚远(2001). 中国家庭养老研究.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 朱安新、高熔(2016). “养儿防老”还是“养女防老”? ——中国老年人主观意愿分析. 妇女研究论丛, 4: 36 - 44.
- Aboderin, I. (2004). Modernisation and Ageing Theory Revisited: Current Explanations of Recent Developing World and Historical Western Shifts in Material Family Support for Older People. *Ageing & Society*, 24(24): 29 - 50.
- Bian, F., Logan, J. R. & Bian, Y. (1998).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Urban China: Proximity, Contact, and Help to Parents. *Demography*, 35(1): 115 - 124.
- Bolzendahl, C. I., & Myers, D. J. (2004). Feminist attitudes and support for gender equality: opinion change in women and men, 1974 - 1998. *Social Forces*, 83(2): 759 - 789.
- Brewster, K. L., & Padavic, I. (2010). Change in Gender - Ideology, 1977 - 1996: The Contributions of Intracohort Change and Population Turnover.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62(2): 477 - 487.
- Brooks, C., & Bolzendahl, C. (2004). The Transformation of US Gender Role Attitudes: Cohort Replacement, Social - Structural Change, and Ideological Learn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3(1): 106 - 133.
- Burgess, E. W. (1960). *Aging in Western Socie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rter, J. S. & Borch, C. A. (2005).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Urbanism and Regionalism on Gender

- Role Attitudes , 1974 - 1998. *Sociological Inquiry* , 75(4) : 548 - 563.
- Chen , V. W. & Pong , S. (2010) . Co - Resident Grandparents and Grandchildren ' s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Taiw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 41(1) : 111 - 129.
- Connidis , I. A. & McMullin , J. A. (2010) . Sociological Ambivalence and Family Ti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 64(3) : 558 - 567.
- Cowgill , D. O. (1972) . A Theory of Aging in Cross - Cultural Perspective. In Holmes , L. D. Ed. *Aging and Modernization*. New York: Appleton - Century - Crofts.
- Corrigan , E. A. & Konrad , A. M. (2007) .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Careers: A Longitudinal Study. *Sex Roles* , 56(11 - 12) : 847 - 855.
- Chang , K. (2014) . Individualization without Individualism: Compressed Modernity and Obscured Family Crisis in East Asia.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imate and the Public in Asian Modernity*. Brill. 2004
- Ciabattari , T. (2001) . Changes in Men ' s Conservative Gender Ideologies: Cohort and Period Influences. *Gender & Society* , 15(4) : 574 - 591.
- Davis , S. N. & Greenstein , T. N. (2009) . Gender Ideology: Components , Predictors , and Consequ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 35(1) : 87 - 105.
- Eisenstadt , S. N. (2000) .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 129(1) : 1 - 29.
- Hartmann , H. I. (1981) . The Family As the Locus of Gender , Class , and Political Struggle: The Example of Housework.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 6(3) : 366 - 394.
- Hashizume , Y. (2010) . Releasing from the Oppression: Caregiving for the Elderly Parents of Japanese Working Women.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 20(6) : 830 - 844.
- Hirschman , C. & Minh , N. H. (2002) .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Vietnamese Family Structure in the Red River Delta.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 64(4) : 1063 - 1079.
- Hu , C. Y. & Kamo , Y. (2007) . The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in Taiw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 38(1) : 105 - 124.
- ICPSR. (2012) . *Japa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JGSS) : 2008*. No. 30661. Ann Arbor , Mi: Inter - University.
- Inglehart , R. & Norris , P. (2003) . *Rising Tide: Gender Equality and Cultural Change Around the World*. Cambridge ,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oyano , W. , Hashimoto , M. , Fukawa , T. , Shibata , H. & Gunji , A. (1994) .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of the Japanese Elderly. *Journal of Cross - Cultural Gerontology* , 9(3) : 323 - 333.
- Malhotra , R. & Kabeer , N. (2002) . *Demographic Transition ,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s and Old Age Security: Emerging Challenges for Social Policy*. IDS Working Papers , 157.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 Lamb , Sarah. (2000) . *White Saris and Sweet Mangoes: Aging , Gender , and Body in North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论文

- Lavee , Y. & Katz , R. (2002) . Divison of Labor , Perceived Fairness , and Marital Quality: The Effect of Gender Ideolog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 64(1) : 27 - 39.
- Lee , K. S. (2016) . Conflicting Views On Elder Care Responsibility in Japa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 57: 133 - 147.
- Levande , D. I. , Herrick , J. M. & Sung , K. (2000) . Elder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Balancing Family and Community Support.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 21(5) : 632 - 651.
- Long , S. O. , Campbell , R. & Nishimura , C. (2009) . Does It Matter Who Cares? A Comparison of Daughters Versus Daughters - in - Law in Japanese Elder Care.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 12 (1) : 1 - 21.
- Nordenmark M. & Nyman C. (2003) . Does Gender Ideology Explain Differences between Countries Regarding the Involvement of Women and of Men in Paid and Unpaid Work?.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 13: 233 - 243
- Motel - Klingebiel , A. , Tesch - Roemer , C. & von Kondratowitz , H. (2005) . Welfare States Do not Crowd out the Family: Evidence for Mixed Responsibility from Comparative Analyses. *Ageing and Society* , 25(6) : 863 - 882.
- Pimentel , E. E. (2006) . Gender Ideology , Household Behavior , and Backlash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 27(3) : 341 - 365.
- Risman , B. J. (2004) . Gender As a Social Structure Theory Wrestling with Activism. *Gender & Society* , 18(4) : 429 - 450.
- Silverstein , M. , Gans , D. , Lowenstein , A. , Giarrusso , R. & Bengtson , V. L. (2010) . Older Parent - Child Relationships in Six Developed Nations: Comparison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Affection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 72(4) : 1006 - 1021.
- Takagi , E. , Silverstein , M. & Crimmins , E. (2007) .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 of Older Adults in Japan: Conditions for Cultural Plasticity.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 62(5) : 330 - 339.
- Yamato , R. (2006) .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s Elderly Dependence in Postwar Japan. *Current Sociology* , 54: 273 - 291.

责任编辑: 郑跃平

attention of many scholars. Howeve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mainly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rst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 well-being of wages and bonuses. Scholars rarely discuss the impact of social insurance (the second income distribution) on happiness. Based on the existing theory of social insurance (SI),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ory (SWB), Self-identified Stratum (SIS), and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perception theory (PSPP),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I and SWB by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13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SIS and PSPP. The study found that SI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public's SWB: those who have old-age insurance are happier than those who don't, those who have medical insurance are happier than those who don't. In addition, SIS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I and SWB, and PSPP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IS and SWB. This study's conclusions help to enrich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SI and SWB and provide valuabl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improve social insurance, improve the social class structure, enhance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and improve public subjective well-being.

Key Words Social Insurance; Subjective Well-Being; Self-Identified Stratum;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Perception

Prone to Tradition or Modernity: Gender Ideology and Eldercare Responsibilities—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 Zi Yan

Abstract Using individual-level data from the 2012 wave of CGSS, JGSS, and KGSS data, this paper tested 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East Asia by highlighting the existence of conflicting gender ideology. This sheds some light on how families think about care responsi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changing gender and family norms and the shifting of elder care responsibility from the private to the public sphere i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Binary Logistic estim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eldercare responsibility as between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is divergent, gender ideolog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on adult children's attitudes towards eldercare responsibility; and, gender ideology has a direct effect on eldercare responsibility.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haven't changed East Asia's filial piety tradition. Instea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s the impetus for the continuity of family support in East Asia.

Key Words Eldercare Responsibility; Gender Ideology; East Asia; Comparative Study; Family Support; Social Support